

陈鑫与甘肃地质的不解之缘

□ 刘志宏

陈鑫(1919—2005),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解放后他辗转在内蒙古大草原和大西北的秦岭、祁连山,开创性地领导了白云鄂博、镜铁山等大型、特大型铁矿的勘探,成绩斐然。作为地质工作者,陈鑫是幸运的。他在镜铁山铁矿和金川铜镍矿的发现与勘探过程中,为甘肃地质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实现了一个地质人为国找矿的夙愿,并与甘肃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五”计划期间,因国家建设需要,一批批地质工作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国家勘探地下宝藏。1955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仍以钢为纲,全国六大区都应有钢铁基地,目前只有西北还没有,使我难以安枕。”4月28日,地质部在甘肃天祝县安远驿成立西北地质局645队,首批工作区域锁定在离河西走廊最近的走廊南山。

1955年8月,645队成立了4个小分队挺进祁连山。年仅21岁的秦士伟被指定由他带领临时小组进入祁连山找矿,这个小组被命名为“秦士伟小组”。10月18日,他们在河谷中找到了“发亮的石头”,经过辨认是铁矿石,后发现了一条赤白相间的铁矿露头带,不远处的沟坡河畔长有一丛白桦树,他们便把新发现的铁矿命名为“桦树沟矿”。

为了加快桦树沟铁矿的评价,西北地质局电告东秦岭地质队,抽调在陕北从事地质工作的陈鑫工程师到甘肃支援645队。年仅36岁的陈鑫,长期在地质勘查第一线工作,其刻苦钻研、积极创新、甘于奉献的工作作风和勤学善思、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以及丰富的野外实践经验和宏观技术管理能力,铸就了他干事业的信心和底气。

秦士伟听说陈鑫来了,就带着发现的矿石标本前来请教。陈鑫听完汇报,看过所有的标本之后,决定进山亲自看看。11月15日,陈鑫和秦士伟向附近藏民借了7天的口粮,准备了60个样品袋,由牦牛驮着再度来到桦树沟。他们仔细鉴别、勘察了矿石的成分,发现桦树沟铁矿除褐铁矿外,还有菱铁矿等,初步估算了桦树沟矿的工业价值。后来,陈鑫和秦士伟多次进入桦树沟,有次上山一连跑了15天,他们沿着裸露的矿层,在北大河东侧找到了铁矿转石。又翻山越岭,历经艰险,爬上壁立于东岸的高山,发现了巨厚的铁矿层,这便是黑沟铁矿

床。黑沟铁矿床与桦树沟铁矿床,峙立于北大河两岸,只有2.3公里的距离。中共甘肃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将上述矿区定名为“镜铁山矿”。

1955年12月初,西北地质局634队在酒泉成立。老红军卢仁槐任队长,陈鑫任技术负责(总工程师),即刻开展桦树沟矿区地质工作。

在天寒地冻的艰苦条件下,陈鑫组织实施的镜铁山铁矿床勘查大会战开始了。他身先士卒和地质队员一道冒风雪、战严寒、走绝壁、攀悬崖,至1956年3月,他们编写了《肃南镜铁山铁矿检查报告》。第一次描述了桦树沟、黑沟、头道沟矿区矿体特征、矿石质量,并计算了桦树沟矿区东段、头道沟矿区铁矿远景储量。报告结论指出:“镜铁山铁矿经过初步检查,已确定其为规模巨大之铁矿。”西北终于结束了没有大型铁矿的历史。

在陈鑫的领导下,最后完成的工业评价和勘探报告,为酒泉钢铁公司建设提供了关键的资源条件。截至目前,镜铁山地区已经发现了大型铁矿床4处,中型钨钼矿床2处,中型铁矿床4处,中型铜矿1处,中型重晶石矿1处。镜铁山铁矿田已查明铁矿石资源储量达到11.3亿吨。

1986年6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地质矿产部在嘉峪关市隆重举行“钢城的开路先锋”纪念碑落成典礼。1980年,地质部授予634队为“地质找矿重大贡献单位”的光荣称号。

在镜铁山铁矿大规模勘查开发的同时,甘肃永昌又传来发现铜镍矿的好消息。解放初期,镍对我国工业生产特别重要。由于缺镍,1吨进口镍就需要付出73吨小麦和1吨对虾的代价;某国为我国加工制造的火车轮毂因为“减料”少镍,缺少强度,在乌鞘岭刹车时竟磨损成了半拉轮子。

1958年10月7日,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时任甘肃省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的汤中立来到永昌,见到了一些地勘单位和群众报来的“矿石”,其中一块核桃一样大小的矿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带着采集的标本和样品到酒泉,向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和祁连山地质队技术负责人陈鑫汇报情况。陈鑫把汤中立带去的标本经过多次观察,想到孔雀石载体黑色岩石要是基性超基性岩的话,这块标本就可能是铜镍矿了。他将标本送到实验室进行铜、镍两项分析,并在送检化验时果断嘱咐:“一定要增

加镍的分析。”

仅仅一句话,一句颇有远见、力达千钧的话,就为金川铜镍矿面世提供了契机。

当天下午测试结果显示,铜镍均达到工业品位,其中镍高达0.9%。这就是金川铜镍矿发现时的第一张化验单。当年谁都不曾想到,正是这张写在纸片上的化验单,竟然决定了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金昌市的诞生。后来,陈鑫多次搬家,在整理书籍时无意中发现的这张化验单居然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1999年5月18日,在金川公司建厂40周年之际,陈鑫将这张整整保存了41年的化验单毫无条件地捐献给公司,现保存在公司档案馆。

看到化验结果的陈鑫兴奋不已,他深知镍的发现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意义重大。当天他就从酒泉驱车夜行400多公里到达矿点,与汤中立等人布置打井,由此拉开了金川“镍钴工业”的序幕。勘探过程中,陈鑫多次和汤中立深入矿区进行分析研究,最终证实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单体铜镍矿床,一举结束了中国贫镍的历史。

金川矿区的勘探,经过了整整15年。15年总计完成钻探工作量18.88万米,相当于钻透了21.3座珠穆朗玛峰。金川铜镍矿床含有铜、铂、钼、铍、铀、钍等20余种伴生元素。地勘累计探明矿石储量5.2亿吨,镍金属量552万吨,镍金属储量在世界同类矿床中列第三位。

1959年,祁连山地质队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的表彰和奖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他一再说到“甘肃镍矿队是个好队”。1978年8月,该队被甘肃省命名为“大庆式”地质队。1986年6月12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部在金昌市金川公园隆重举行了“地质工作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陈鑫、汤中立,这两个在金川铜镍矿发现和勘探史上永远闪光的名字,作为镍都开拓者的代表,被镌刻在金昌市地质工作纪念碑上。

1980年,在全国地质系统建国三十周年地质找矿授奖大会上,陈鑫被地质矿产部授予“建国三十年地质找矿有重大贡献地质工作者”奖。2005年11月10日,86岁的陈鑫在北京与世长辞。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国家、对甘肃地质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将永世长存,与甘肃地质结下的的不解之缘将永远在嘉峪关、金昌两座地质纪念碑上熠熠生辉。



珍赏

明青花斗彩柿子纹菱口盘

□ 郑学富



题为明宣德青花斗彩柿子纹菱口盘,高6.1厘米,口径33.5厘米,底径22厘米。盘作菱口,折沿,浅壁瓜棱腹,广底,圈足。盘底心绘折枝柿子树一枝,上结柿子4枚。盘内墙绘菊花、山茶等折枝花卉8朵,等距分布,潇洒利落。近口沿处写“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横联,笔法规整秀丽。该盘胎质细白,釉层肥厚,手感极其柔滑,触摸上去就如婴儿肌肤般

细腻,纹饰浓艳而又沉稳。

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中,明宣德朝是景德镇瓷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制瓷技艺精益求精,有许多新的发明创造。斗彩瓷是明代宣德时期御窑厂烧制的又一陶瓷新品种,它是在元代红绿彩和五彩瓷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试而获得成功的。青花斗彩是以釉下青花作为一种色青而与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瓷器装饰技法。图案中的蓝色部分先以釉下青花描绘并且留白,上釉烧成后再用釉上彩料彩绘其留白部分,最后入炉烘烧而成。遂有釉下彩与釉上彩呈现斗妍斗美之态势,故称“斗彩”。初创时期的宣德斗彩,技术上尚不够成熟,色彩也不够丰富。明成化年间,在宣德斗彩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斗彩已经声名显赫。清代斗彩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品为佳。

柿子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从汉唐时期的铜镜到明清时期的瓷器,柿子纹随处可见。柿与事、世谐音,纹饰取事事如意、世世平安的寓意。在构图方式上,柿子除了单独构图以外,还常与其他器物组合使用,表达吉祥美好的祝愿。

岷州城里的晨钟暮鼓

□ 潘砚珍

晨钟暮鼓,即早晨的钟声,傍晚的鼓声,又作“暮鼓晨钟”,原指寺庙中早晚用以报时的钟鼓声。岷州卫城内曾建过用于报时的钟楼和鼓楼。

据《岷州志·楼阁》记载:“钟楼:在厅治东。明万历十一年副使罗维垣、同知侯国安创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同知汪元炯重修。”岷州钟楼位于岷县城今和平东路(古称静远街)与新民街(古称隍庙街)、钟楼巷十字路口,有平台四层,在四台上修建了九层楼房,底大尖小。楼顶悬挂铁钟一口,每逢节日或发生重大事件,敲响

铁钟,全城皆闻。钟楼下悬挂的铜钟铸造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是为庆祝岷州卫军民指挥使的设置以及城垣建筑完毕而铸造的。铜钟造型古朴典雅,发音洪亮。此钟通高1.65米,口径1.23米,壁厚8至10厘米不等。钟身上下饰两组四线方格纹,方格内铸有铭文(铭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载开设岷州卫的史实,第二部分为岷州卫“本卫官”与“合属官”的署名,是补地方志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钟口沿饰宽带状及八卦符号。清末钟楼毁于兵燹,铜钟移于宣道会。民国



南梁红色故事

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 刘崇刚

这一天,谢子长显得格外高兴,伤痛使他直不起腰,咳嗽得喘不过气,一句话有时要停几次才能说完。刘志丹看到这位叱咤疆场的老战友说话艰难的样子,忙扶他躺下,给他盖好被子。看到子长盖的被子很薄,就关切地说:“你铺的褥子和盖的被子这样薄,这怎么行,叫盛英给你换一下。你这同志我知道,一贯为别人着想,就是不管自己。”谢子长有气无力地说:“只要伤好了,就能继续为革命工作,这被子没关系。”谢子长又说:“你不要再费心了,我可能不行了,今后的担子就要你挑了……”说着,便流下泪来。刘志丹也流下了泪,这两位驰骋疆场的战将,这时手握着手哭了。在场的战士、干部、老百姓也都泪流满面。

说话间,刘志丹看见趴在谢子长跟前的谢绍明,就慈爱地抚摸着小绍明的头问:“叫啥名字,几岁了?”小绍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不作回答。站在旁边的继母史秀芸忙给他解围说:“叫双玉,十岁了。”

刘志丹又问:“你长大了干啥?”

不等儿子回答,谢子长就说:“长大了跟上刘叔叔当红军!”

听父亲这么一说,小绍明才抬起头一板一眼地大声说:“跟刘叔叔当红军!”看着绍明那认真的样子,谢子长、刘志丹和大家都笑了。

1935年2月周家硷会议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白坚到灯盏湾向谢子长汇报会议召开情况。谢子长听着……听着不停地说:“这下就好了……西北革命有希望了……老百姓有盼头了……老刘不来,农民要受害……”

此时,革命需要谢子长挥戈上马,但他的病情却突然恶化了。

听到谢子长病危的消息,乡亲们纷纷赶到灯盏湾看望他。从早到晚,四处来的乡亲们站满了院子,要求最后见一面他们的“谢青天”。警卫人员给他们做工作,劝他们回去,但是谁也不走。男女老少冒着寒风,有的暗暗流泪,有的则放声痛哭。有个老婆婆提着鸡汤,小脚一跌一颠,从十多里外的山路赶来,提来的鸡汤都冻成了冰块块。她一见谢子长已不省人事,就放声大哭着说:“我们不能没有你啊!老谢……”

有些群众急得没有办法,有的去柏山寺求神,有的去石公寺求神许愿。这当然无济于事,但却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愿,以及子长和群众深厚的感情啊!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与世长辞了,年仅38岁。临终前,他睁开微闭的眼睛,难过地说道:“老百姓怕我死,这个心情好理解。只可惜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这句话说得跟前的家人都哭了。接着,他又挣扎着说:“不要因为我的死伤心,要很好地战斗,多打胜仗,为死难烈士报仇!”说罢,几颗晶莹的泪珠就从眼眶里涌出来,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谢子长去世后,为了不影响陕北根据地军民的情绪,防止敌人乘机袭击,中共西北工委决定保密,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家属和战友们都不着孝服,不戴黑纱,将谢子长的遗体秘密安葬在离灯盏湾20多里远阳道岭村的一个山沟里。西北军委的布告文件仍签署他的职衔姓名。直到这年5月上旬,红军解放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的永坪镇后,才逐渐地公布谢子长去世的消息。

谢子长去世后,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陕甘边、陕北的人民群众,继续同敌人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1935年5月,中共西北工委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谢子长病逝后,毛泽东先后为其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2009年9月,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文章选自《南梁红色故事》·连载下)

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为弘扬正气,由民众出资,在李贵悟、车世明等人主持下,在城南二郎山平台建成一座重檐四角攒尖顶正气亭,遂移铜钟悬挂其下,从此改称二郎山明代铜钟。

清康熙年间,洮岷道金事谢绪光作诗《秋日登镇边楼》。鼓楼,又名镇边楼,位于和政街与崇俊街(今南明街)之间的十字路口。这里原有一股流水穿城而过,修建时原楼下有桥,俗称鼓楼桥。鼓楼高九层,设顶棚一,棚下置大鼓一面,每逢有事,击鼓通报。岷县城内流行两句俗语:“岷州有座钟鼓楼,半截钻入云里头。”诗句中的“钟鼓楼”特指鼓楼,钟楼高城墙4丈有余,用高耸入云形容它更准确。据传鼓楼建于宋代,“镇边楼”即鼓楼,在道署西。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副使迟凤翔重建。“鼓楼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修过一次,1913年后倒塌,1917年拆除。

唐代的茶税

□ 张天雁

我国是茶的故乡,商代就开始栽种茶树,汉代茶叶已发展成为商品,魏晋南北朝时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唐代饮茶之风也遍及北方,中唐时期饮茶之风更普遍,茶已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饮茶之风也影响到周边少数民族,唐代在西北开设了与少数民族交易的茶马互市,茶叶已成为市场上重要商品。因此,在继盐、铁、酒税之后,便产生了茶税。

茶税,就是对茶叶征税,我国对茶征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安史之乱后,国库日渐空虚,为了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唐德宗李适接受户部侍郎赵赞建议,在诸道水陆要冲之地,设置税吏,征收商税,规定每贯税二十文,对竹、木、茶、漆等产品征税,税率为10%,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茶税从此开征。茶税开征之后,唐德宗兴元二年(785年)停征茶税,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户部侍郎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上书,建议恢复征收茶税,规定产茶的州县的茶山及商运要路就地征税,茶叶分为三等,估价征收,税率为10%。茶税首次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税种。

唐穆宗李恒长庆元年(821年),成德(今河北正定县)、魏博(今河北大名县)两节度使叛乱,因平叛导致国库空虚,盐铁转运使王播建议增加茶税,税率增加到15%,大幅提高了税收收入。唐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年),宰相王涯建议实行榷茶制度,由官府垄断茶叶的产销经营,不久又改为以税收形式征收茶税;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建议增加江淮一带的茶税,规定茶商所过州县均征重税,或将茶商运茶的车舟就地扣下,以抵茶税。之后,又推行茶叶专卖制度,征收民间茶园,规定茶的生产贸易,全部由官府经营,后因反对而取消专卖,依旧恢复了茶税征收制度。

唐宣宗李忱大中二年(848年),朝廷下令庐(今安徽合肥市)、寿(今安徽寿县)、淮南等州增加茶税半成,导致全国茶税倍增,正税之外,又加横税,茶税提高到20%,而且由初期的按价计征改为按重量计征。由于诸道关卡林立,流通渠道不畅,市场供应偏紧,私茶贩卖猖獗,偷税逃税行为日益严重。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盐铁转运使裴休在长沙制定《税法十二法》,不仅规范了地方政府税收征收行为,保护了商人利益,促进了商品流通,而且还禁止各州层层设卡,打击偷税行为,有力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发展,使得茶税税收收入成倍的增加。

唐代还设立“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加强对茶税的税收征收管理,茶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逐步增加。唐德宗推行茶税初期,茶税年税收收入为40万贯。唐文宗大和年间,江西饶州浮梁县是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仅浮梁县茶税年税收收入就达15余万贯,而这一时期全国矿冶税年税收收入才7万贯,还抵不上一个县的茶税。到唐宣宗时,茶税年税收收入达80万贯,茶税已成为与盐、铁等税收并列的主要税种,也成为唐代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